

俄羅斯的民主抉擇與 統治菁英權力結構變化*

許菁芸** 宋鎮照***

- 一、前言
- 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與半總統制類型
- 三、俄羅斯統治菁英之結構組成與衍生問題：非制度性因素
- 四、俄羅斯民主抉擇
- 五、結論

「梅普共治」中普金的強勢總理角色，無論在形象上或權力上似乎都超越了總統梅德維傑夫。要如何去解釋俄羅斯半總統制高度人治的現象，是個極為有趣的議題。憲政法規與政黨政治之制度性因素對於解釋俄羅斯高度人治現象是否具有一定的分析張力？抑或是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普金所領導之統治菁英派系

* 本文發表於 100 年 3 月 26 日於東海大學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第二屆民主與半總統制研究會。

**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國科會專案助理研究員、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mail: jf.hsu@msa.hinet.net

*** 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特聘教授。E-mail: jennjaw@mail.ncku.edu.tw

投稿日期：2011 年 05 月 16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1 年 10 月 16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四期/頁 117-175。

與權力傾軋更能對俄羅斯該特有現象提供不同層次的思考？因此，本文焦點是放在統治菁英權力層級的結構與缺陷，並探討其權力消長與變化，進而影響俄羅斯民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改變，分析普金政權之權力層級與權力層級的推手－俄羅斯資源型經濟，並由此導出為何普金會在 2008 年將總統職位交與梅德維傑夫，自己退居總理職位，卻能在未修憲的情況下，讓總理之權高於總統。最後，並試圖建構俄羅斯人民的民主抉擇模型來導出普金架構的統治菁英是否成功地以中央集權政策將權力集中於莫斯科中央，而俄羅斯民主抉擇的變項會對俄羅斯的半總統制與民主的未來會產成何種影響，皆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俄羅斯、民主、半總統制、菁英、中央再集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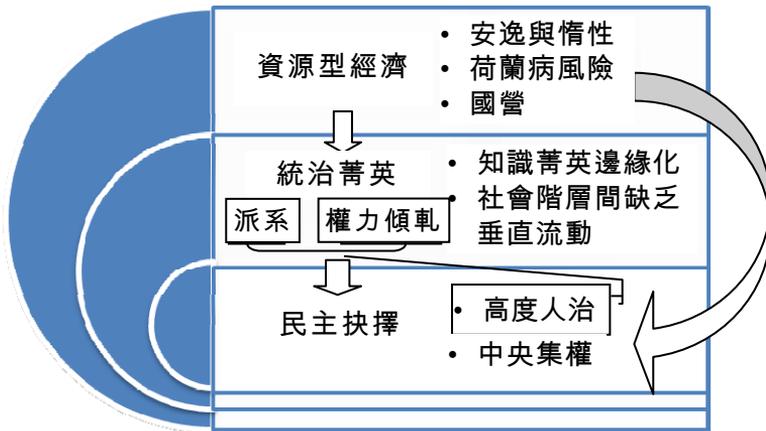
一、前言

一般文獻共識，俄國憲法中總統權力較國會大，總統權力運作在葉爾欽、普金時期有擴大的趨勢，總理只是擔任「避雷針」角色，大家專注的焦點都在府會之爭。而在半總統制的研究中，無論國外或國內的學者，都將總統和國會爭奪對於政府（總理與內閣）的控制視為是半總統制的結構性缺陷，也將研究的重點擺在總統的權力、府會關係、以及政黨體系上。但此情勢卻在 2008 年後出現了逆轉，「梅普共治」中普金的強勢總理角色，無論在形象上或權力上似乎都超越了總統梅德維傑夫。要如何去解釋俄羅斯半總統制高度人治的現象，是個極為有趣的議題。俄羅斯憲法設計、長久積弱的政黨與國會是否真的扮演了總統與總理權力競逐的工具？也就是說，憲政法規與政黨政治之制度性因素對於解釋俄羅斯高度人治現象是否具有一定的分析張力？抑或是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普金所領導之統治菁英派系與權力傾軋更能對俄羅斯該特有現象提供不同層次的思考？

故，俄羅斯普金政權之統治菁英權力構成，與其鞏固權力層級的主要作法，也是值得探討。普金在其總統任職期間，積極地建構並鞏固其權力層級，尤其是上層的權力菁英與中層的官僚結構，而這樣的布局卻也造成了政治與社會分離的奇特景況，因此，本文焦點是放在統治菁英權力層級的結構與缺陷，並探討其權力消長與變化，進而影響俄羅斯民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改變，分析普金政權之權力層級與權力層級的推手 - 俄羅斯資源型經濟，並由此導出為何普金會在 2008 年將總統職位交與梅德維傑夫，自己退居總理職位，卻能在未修憲的情況下，讓總理之權高於總統。最後，並試圖建構

俄羅斯人民的民主抉擇模型來導出普金架構的統治菁英是否成功地以中央集權政策將權力集中於莫斯科中央，此外，俄羅斯民主抉擇的變項會對俄羅斯的半總統制與民主會產成何種影響，皆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分析架構（見圖一）將分析俄羅斯的統治菁英間的權力結構與變化，特別就普金政權，也就是 2000 年以後的統治菁英作為焦點，就派系與相互間權力傾軋解釋俄羅斯的高度人治現象，並就統治菁英的權力結構與導致的社會問題影響了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資源型經濟對於統治菁英權力鞏固與中央集權的推波助瀾，來解釋俄羅斯的民主抉擇：威權與中央集權是俄羅斯的抉擇，而非必要或必須走的路徑，只是統治菁英間的權力傾軋與權力鞏固、社會階層的不合理現象與資源型經濟帶來的安逸與貪污促使了俄羅斯走上政治威權的道路。這民主化路徑的迴轉，則要視全球的能源價格起伏與俄羅斯權力階層的合法性的維持而定。



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俄羅斯民主化進程與半總統制類型

(一)「民主倒退」V.S.「主權民主」

麥克佛 (M. McFaul) 認為，在 1989 到 1992 年之間發生在共產集團國家的民主化浪潮產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McFaul, 2005: 5)，吳玉山據此將之區分為「穩定民主群」 (stable nascent democracies)、「總統專制群」 (presidential autocracies) 與介於兩者之間的「競爭性的威權體制」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¹ 俄羅斯就是屬於「競爭性的威權體制」的代表國家 (吳玉山，2007: 71)。

俄羅斯雖然在 1993 年 12 月通過以三權分立、多黨制、主權在民等典型西方憲政原則為主的俄羅斯憲法，也符合葉爾基 (R. Elgie) 所提出之半總統制定義，即「半總統制即是一個政治體制 (regime) 同時擁有一位民選固定任期 (fixed-term) 的總統和一位對立法負責 (responsible to the legislature) 的總理與內閣」 (Elgie, 2007: 60)，而俄羅斯在前述之憲法框架下，舉辦定期的總統與議會競爭性選舉，但由於執政者掌握了一切資源，並且運用包括控制選舉在內的一切方法來維持執政地位，特別是在普金八年的執政時期，選舉的

1. 「穩定民主群」如波蘭、捷克 (後來再加上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等中東歐國家，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前蘇聯共和國出現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權，進行了多次的政黨輪替，民主鞏固有了穩定的進展；「總統專制群」如中亞國家，除了吉爾吉斯之外，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塔吉克基本上都是由在蘇聯時期就掌權的各國共黨第一書記持續主政，只不過其身份變成了總統，而且大部分還透過公民投票或修改憲法，使自己成為實質上或法律上的終身總統；「競爭性的威權體制」就是一種雖然具有競爭性選舉，但是政權還是牢牢掌握在威權統治者手中的制度，如俄羅斯。

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性的意義，因此被認為並非真正的自由民主體制，僅是一種准民主、或半民主的情況（吳玉山，2007：71-72）。

但，俄羅斯的民主化走向隨著普金的個人威權的鞏固招致了許多批評，尤其是西方學者對於俄羅斯民主的撻伐，費雪（Fish, 2005）在其《俄羅斯民主脫軌：開放政治的失敗》（*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一書中，運用量化的VA Scores和FH Scores評分結果，認為俄羅斯不僅出現民主倒退，更斷言俄羅斯的民主失敗。² 而費雪的論點更代表著西方學者的立場鮮明，符合現階段西方學者對俄羅斯民主發展的負面看法。

反之，俄羅斯方面對於此項評價極其不以為然。普金一向強調俄羅斯已經是民主國家，從不籠統地否定民主，以免給西方提供俄羅斯「民主倒退」的藉口，普金在2005年4月25日的《國情咨文》中指出，講民主、自由必須顧及俄羅斯歷史，從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和國情出發，民主原則和民主標準不應導向國家解體和人民貧困，而應使國家更加安定團結，人民生活水準進一步提高，在建設民主的問題上，俄羅斯遵從的不是外國夥伴的態度，而是本國的現行法律（Путин, 2005）。普金在其多次的演說發表中，都強調要樹立能為廣大社會階層普遍接受的俄羅斯「新思想」（The New Thought,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俄羅斯「新思想」擴及多層面，將西方的民主價值觀與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觀念和社會團結等俄羅斯傳統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學者認為這就是未來俄羅斯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

2006年6月28日，俄總統副幕僚長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

2. 費雪（Fish）認為俄羅斯已經出現民主倒退，原因在於原物料資源豐富、經濟自由化不足和超級總統制之憲政結果。

Владислав Юрьевич Сурков)在會見外國記者時提出了「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政治概念(Сурков, 2006)。2006年8月,俄羅斯的權力黨統一俄羅斯黨宣布,「主權民主」正式成為該黨的官方意識形態。針對此項宣布,2006年8月31日俄輿論「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直接指出,主權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它「準確地指出了,普金政權的政治內涵」及其「政治體制的特點」(Известия, 2006)。普金從執政理念把民主定位於「主權民主」,並以此來反擊西方的抨擊與控制策略,是其執政理念與實踐的發展與創新。

普金在2007年4月26日的國情咨文中明確指出政治價值觀確立與鞏固的非常重要性。在普金看來,主權和民主都重要,但相比之下,主權又比民主更重要。他認為,「主權是當今最寶貴的東西,可以說是無可替代的。沒有主權,俄羅斯無法生存。在俄羅斯,民主只有在擁有主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鞏固,同樣也只有在擁有主權的情況下才談得上國家的發展與民族的復興」(Путин, 2007)。「主權民主」的核心就是強調俄羅斯式的民主模式,它既是一種意識型態,也是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民主程序和準則必須服從於愛國主義和強權國家體制的建造。簡言之,「主權民主」概念的核心就是權威主義,即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依據法律法規強化中央權威,強化國家主權,而梅德維傑夫時期,俄羅斯政治發展的主要特徵是延續性,而延續性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延續普金的政治理念。

綜合前述,俄羅斯主權民主的走向是為了終結俄羅斯自葉爾欽以來的政經亂象,也有一說是蘇聯長達70年的統治,已經讓俄羅斯

傳統政治文化和民主背道而馳。³ 但，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有不同的看法，其認為俄羅斯民主停滯，並走向政治威權並非必要，而是普金的抉擇 (Putin's Choice)。對普金和他的政治菁英而言，一個真正的民主系統會威脅其權力與財富，「主權民主」為其中央集權措施的裝飾性說法，並無法指引俄羅斯的未來，因此普金只能將民眾的焦點聚集在俄羅斯的民族自尊、權力、國際地位和經濟成長，卻無法繪出俄羅斯的長期發展藍圖 (Brzezinski, 2008: 100-105)。

(二) 半總統制框架下的高度人治：制度性因素探討

俄羅斯聯邦的憲政體制是基本上是半總統制，很多學者對於這點都有共識。⁴ 但對於俄羅斯是屬於半總統制下的何種政權類型，則存在著很多意見紛歧。

從俄羅斯聯邦民主轉型過程來看，1993年12月12日通過的俄羅斯憲法與同日舉行的國家杜馬的選舉，是俄羅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但因為憲法賦予總統比之國會較大的權力 (Troxel, 2003: 31-33)，⁵ 且在實際的權力運作上，國會因為歷史因素及結構上的

3. 但如果拿烏克蘭來相比較，烏克蘭與俄羅斯相鄰，文化上與俄羅斯緊密聯合，同樣受蘇聯的統治，也和俄羅斯一樣承受蘇聯解體的影響，卻沒有因為要解決國內問題而走向民族獨裁。

4. 如林茲 (Linz and Valenzuela, 1994)，特羅謝 (Troxel, 2003)，吳玉山 (2002)，葉爾基 (Elgie, 2007; Elgie and McMenamin, 2008) 等。

5. 特羅謝和史黛克 (Troxel & Skach) 根據舒加特和卡瑞 (Shugart and Carey) 的總統權力測量指標模型 (1992) 修正建構而成的「特-史模型」 (The Troxel- Skach mode) 中的指標量化測量俄羅斯總統與議會權力，結果總統因為總統得發布命令取代議會立法 (decree power) 及解散內閣權 (cabinet dismissal)，得分為 24 分，議會雖在部份否決權 (partial veto) 與修憲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權優於總統權力，

弱點，如上議院的傀儡化、國會政黨的分裂、無執政黨等因素而導致積弱不振，無法發揮其憲法上應有的權力，因此，對於俄羅斯在半總統制下的次類型看法，在 2008 年普金卸任以前，超級總統制（*super-presidentialism*）或總統 - 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ism*）皆是學界普遍的看法。而 2008 年以後，梅德維傑夫（D. A. Medvedev, Д. А. Медвѐдев）當選總統，普金轉任總理兼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如依舒加特和卡瑞（Shugart and Carey）認為的杜瓦傑（M. Duverger）半總統制為「總理—總統制」定義（Duverger, 1980: 165-87），⁶ 俄羅斯似乎自 2008 年起開始啟動「總理 - 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ism*）的腳步，但從普金擔任總理兼任國會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黨魁，再從普金在總理位置上的強勢主導行政態勢，和梅德維傑夫居於臣屬與反抗矛盾情結中看來，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呈現了高度人治的現象，也就是普金佔據哪一個位置，俄羅斯就是哪一種體制。將來即使普金又在 2012 年選上總統，讓俄羅斯的體制又顯現了總統 - 國會制的樣貌（許菁芸，2010：122-125）。

而在憲法的半總統制的框架下，俄羅斯高度人治的現象也讓西方學者認為是政治威權的再現，嚴重影響俄羅斯的民主進程。對於俄羅斯高度人治的解釋，如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俄羅斯憲政體制和國會政治（國會與政黨）面來觀察，是不夠的。其一，從憲政體制面觀，普金從總統轉任總理，卻讓總理從以前被總統架空之行政權轉而成為實質的權力，俄羅斯的憲政體制並無改變，也就是沒有修憲的狀況下，這其中的轉變不謂不大。在半總統制研究的文獻當

但在內閣組成權力（Cabinet Formation）上遠低總統權力，得分為 20 分。

6. 根據杜瓦傑（M. Duverger）的論點，半總統制具有三個特徵：其一，總統由普選產生；其二，總統擁有相當的權力（*considerable powers*）；其三，存在獨立的內閣掌握行政權，並對國會負責。

中，總理定位經常屬於次要角色的情況。學者在建構半總統制運作類型時，府會關係、總統權力行使，以及行政、立法互動，常成為建構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基礎，而總理雖居於總統與國會在人事競爭與政策競爭的核心，卻較為少見其在相關研究中被突顯。換言之，總統、總理、國會三角互動關係當中，總理多被認為是附屬於其他兩者的權力角色，如以總理負責方向為核心切入，總理負責的方式其實可細分為總理只向總統負責，總理只向國會負責、和以總理同時向國會與總統負責（張峻豪，2010：6-7）。但，普金卻能以「總理」之角色跳脫此傳統總理的負責方式，且在總統具有總理提名權與任命權（憲法第 83 條）、憲法命令權（憲法第 90 條）、解散國會權（憲法第 84 條）外，還「可作出關於俄羅斯聯邦政府辭職的決定」（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жет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е об отстав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憲法第 117 條第 2 項）的俄羅斯憲政體制，與俄羅斯從 1991 年獨立後，在葉爾欽時期總理每逢政治或經濟危機就擔任避雷針而被撤換的慣例，⁷ 和普金時期為了權力鞏固而撤換，⁸ 普金不僅在 2008 年底所爆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下之人民認定的責任歸屬脫身而出（Левада-Центр，

7. 葉爾欽在其總統任期（1991-1999）中換了 6 位總理—蓋達（Yegor Gaidar, E. T. Гайдар）、切諾梅爾金（Viktor Chernomyrdin, В. С. Черномырдин）、基里延科（Sergei Kiriyenko, С. В. Кириенко）、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 Е. М. Примаков）、斯契帕申（Sergei Stepashin, С. В. Степашин）和普金。

8. 普金在其總統任期（2000-2008）中換了 3 任總理—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 М. М. Касьянов）、弗拉德科夫（M. E. Fradkov, М. Е. Фрадков）和祖布科夫（Viktor Zubkov, В. А. Зубков）。

2009)，⁹ 並持續強勢地主導國家行政與國會立法。因此，如果試圖半總統制的框架和次類型的定義解釋俄羅斯的高度人治現況，可以看出，半總統制定義下的憲政規範和俄羅斯的憲政實踐是矛盾的，故本文作者認為，從半總統制的次類型定義俄羅斯現行體制是無意義的，俄羅斯的半總統制仍必須在日後去除高度人治的變項後，再觀察其憲政實踐，才能真正去評斷俄羅斯的民主走向。

其二、從國會政治面觀，「總理—總統制」制中總統 - 總理權力之政黨介質角色，是否可以解釋普金的高度人治，這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趙竹成(2010)認為政黨是總統 - 總理權力運作的介質，並以兩方面來探討總統權力的限制，一、因為俄羅斯總統向來是無黨籍，總理是否兼多數黨主席是會影響俄羅斯半總統制的權力天平朝總理或總統傾斜。二、聯邦主體的行政首長任命須受到地方議會的制約，而地方議會掌控在多數黨手中，也就是統一俄羅斯黨手中，亦就是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普金手中(趙竹成，2010：9-22)。

關於俄羅斯總統無黨籍的潛規，是從葉爾欽 1991 年擔任總統，他認為黨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而他代表國家，他就是國家，無需政黨的加持，再加上當時的人代會支持葉爾欽的政策，因而使得葉爾欽並沒有在獨立後的第一時間內舉辦國會選舉，更在 1993 年砲打國會後，對於共產黨的勢力嚴加打壓，費雪(S.Fish)曾言「從八〇年代他(葉爾欽)的鬥爭經歷開始，到 2000 年總統生涯結束，葉爾欽始終對政黨帶有蔑視，他拒絕領導或加入一個政黨，他認為自己超越了一般政治，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代表了整個國家利益的全民

9. 列瓦達分析中心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三日公佈之「梅德維傑夫、普金和政府的責任歸屬」民調中，對於誰應該為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負責任，俄羅斯政府首長得票率 36% 最高，梅德維傑夫 23% 次之，普金 17% 為三者中最低。

領袖」(Fish, 2001: 233)。而普金雖然頒布了「政黨法」，但普金也遵循了葉爾欽超然於政黨之外的潛規，在其總統任期內從未加入任何一個政黨，因為普金個人的聲望與政策績效超越任何一個政黨，而政黨與國會在俄羅斯人民的心目中的政治角色排行是倒數第一和第二(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07)。

因此，如果從政黨的不成熟與國會的弱勢去推定「總統無黨籍，總理是否兼多數黨主席是會影響俄羅斯半總統制的權力天平朝總理或總統傾斜」之傳統政黨政治運作，對俄羅斯高度人治的現象，也就是對總統權力的限制解釋，也是亟待商榷的。其一、即使在普金的運作下，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於2003年與2007年國會大選成為國家杜馬的第一大黨，也僅是「權力黨」，而普金雖在2008年接任統一俄羅斯黨黨魁，但嚴格說來，統一俄羅斯黨仍不是「執政黨」，蓋其中的差別是普金並不是為了實踐統一俄羅斯黨的黨綱而執政，反之，是統一俄羅斯黨是為普金的理念服務，因此，本文作者認為，假設在2012年普金再次當選總統，總理兼任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此權力天平還是會朝總統普金傾斜。其二、普金雖然身兼總理和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但在2008年政府內閣16位部長中，只有三位是統一俄羅斯黨員，由此可見，統一俄羅斯黨並不具有標準政黨政治中多數黨的重要性(Ministry Poluchat Partbilet, 2008)，僅是普金鞏固權力的具民主裝飾性的工具，僅有輔助意味，而非真正的決定因素。

再者，「聯邦主體的行政首長任命須受到地方議會的制約，而地方議會掌控在多數黨手中，也就是統一俄羅斯黨手中，亦就是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普金手中」之限制總統權力看法，本文作者認為俄羅斯此作為立法於普金於總統職位之時(亦即在2004年)，普金

此作為，整體而言，並非限制總統權力，而是為俄羅斯中央再集權政策作加持，也就是鞏固中央權力。綜觀普金時期（2000-2008）之中央再集權政策，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strong state），試圖恢復有效的垂直權力鏈（restore an effective vertical chain of authority）體系（Ross, 2005: 355），觀察其實際運作，所謂的垂直權力鏈體系現象，普金從建立自身的權力菁英開始，以迅速崛起的經濟成長及國家政策的漸次調整為輔，逐步建立自身的權力層級（power hierarchy）- 普金與權力菁英建構了普金政權，資源型經濟驅使中央集權的動力，普金政權控制國會與政黨，政黨再控制地方議會及首長，而地方議會和首長再來控制聯邦主體，出現層層權力鏈的控制。

由此推知，俄羅斯的高度人治與民主停滯（或稱民主倒退）的政治威權呈現，政黨、選舉與國會在目前的發展僅是普金政權的工具，但，半總統制仍是憲政規範的框架，因此，布里辛斯基認為普金八年的統治，雖將俄羅斯的民主退回善變、中央集權的政體，但也至少適度地進展到規則的憲法體制，也無修改憲法，於此，更可證明俄羅斯實質上轉向政治威權並非必要，而是其抉擇（Brzezinski, 2008: 106）。

俄羅斯的民主抉擇，也就是轉往政治威權與中央再集權政策，本文作者認為如上所述，是與普金的權力菁英層級建構（亦即非制度性因素）和其衍生的經社問題有著極密切的關聯，而這是否也能提供俄羅斯高度人治現況與普金轉任總理後，權力天平從總統轉至總理的現象的解釋，是本文以下要探討的重點。

三、俄羅斯統治菁英之結構組成與衍生問題：非制度性因素

波特等 (Potter, Goldblatt, Kiloh and Lewis) 所著《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一書中特別提到民主化模式三種理論取向：第一、現代化理論途徑 (modernization approach) - 強調許多有關現行自由民主或成功民主化所必要的社會與經濟要素；第二、轉型理論途徑 (transition approach) - 強調政治過程及菁英的主動與選擇，以解釋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民主的緣由；第三、結構理論途徑 (structural approach) - 強調有利於民主化的權力結構變遷 (Potter et al., 1997: 10)。其中轉型理論研究途徑乃是以政治菁英為焦點，而非人民。而俄羅斯的主權民主與中央集權化走向，也就是西方學者所稱之「民主逆流」(Carothers, 2006: 55-68)，也是大體上取決於政治菁英的行為，及其行為時機、地點與方式，因為，「菁英決定轉型的界線、安排進程及控制結果」(Hughes, 1997: 1017-1036)。因此，布里辛斯基概括俄羅斯的民主現況是普金的抉擇，更精確來說，他和俄羅斯學者伊諾忍徹夫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Vladislav Inozemtsev) 的認定相同，俄羅斯現今的體制得「歸功」於普金政權 (Putin Regime)，但，普金政權是普金與其背後的統治菁英所架構，此體制是更反映出普金與其統治菁英的特質、背景與思維模式，其主要目的就是鞏固自身的權力。支撐普金統治菁英權力層級的基本思想，國家 (state) 是一個霍布斯式的巨靈，對人民不用負擔責任而只追求自身的利益。本質上來說，俄羅斯統治菁英的「國家」(state) 一詞意謂著統治階級，以及這個統治階級為確保自身優勢地位所創造

出的機制的代名詞 (Inozemtsev, 2009: 40-60)。

(一) 普金政權統治菁英的來源、背景與特質

關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統治菁英的來源有著兩派的觀點，一派主張「菁英流動」(elite circulation)，¹⁰ 認為蘇聯時期的菁英集團 - 「黨政權勢人物」(nomenklature,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已由社會各階層的新興菁英所取代；另一派主張「菁英再生」(elite reproduction)，¹¹ 認為蘇聯時期的黨政菁英並沒有消失，而是經由俄羅斯的私有化政策，間接將前蘇聯的權力資本化，在葉爾欽時期，搖身一變成為新一代的俄羅斯政治菁英，並且或在政界成為「權力黨」，或在金融工業集團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與潛力。此兩派雖然對於俄羅斯統治菁英的產生有著不同的看法，但，觀察俄羅斯的統治菁英，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也就是在「威權競爭群」中的俄羅斯，新舊菁英雖大部分不是「同一」，卻是「同源」的 (吳玉山，2007：83-84)。雖然在普金時期，普金打擊寡頭，但其打擊寡頭的目的是為了清除葉爾欽時期的權力菁英，普金雖建構了自身的統治菁英徵補方式，但，仍有大部份來自前蘇聯的黨政結構，尤其是來自於擁有蘇聯思維和傾向的人 - 有 75%-78% 的政府官員是來自於前蘇聯軍方、國家安全或國際事務機構 (Inozemtsev, 2009: 42)，其新領導階層和蘇聯舊統治菁英還是有很強的延續性。

值得注意的是，普金時期的統治菁英結構有兩個問題，而藉此

10. 如 Rivera (2000: 413-432); Lane and Ross (1995: 52-75); Lane and Ross (1998); Lane and Ross (1999)。

11. 如 White and Kryshstanovskaya (1998: 125-146); Hanley et al. (1995: 639-66); Pakulski et al. (1996: 133-147); Kryshstanovskaya (1995: 10)。

衍生出嚴重的政治與社會脫節問題，進而阻礙了俄羅斯的民主發展：

1. 知識菁英的邊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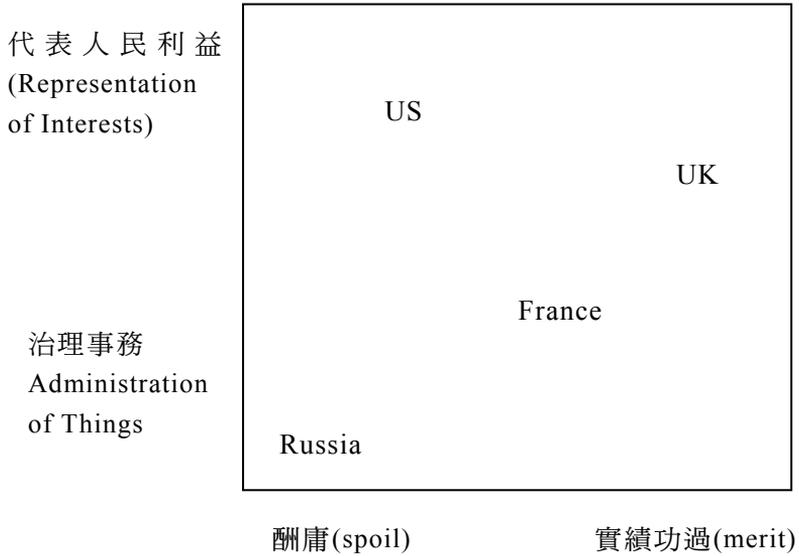
前蘇聯時期的黨政菁英在俄羅斯的菁英再生過程分成了兩種不同的類型：政治菁英和經濟菁英，前者源於政治職位和聲望，後者則是基於對資本的控制（Kryshtanovskaya and White, 1996: 711-733），但前蘇聯的知識菁英卻被邊緣化，因為，此一階層是民主的動員力量（Hughes, 1997: 1017-1036）而隨著國家主義（statism）的擴張，普金政權對於統治菁英選用的標準更加在於政治菁英對於當權者的政治認同、是否對其統治地位構成威脅、和能否貫徹當權者的意志，也是基於個人與派系、家族的關聯（也就是親信）或酬庸性質，而非知識、才能與實績功過（merit）（Huskey, 2010: 370）。從圖二的統治思想與菁英徵聘系統和各國的比較來看，俄羅斯明顯的是落在左下角。

再者，上層的統治菁英的組成上就大多來自蘇聯的黨政結構，知識菁英卻是蘇聯變革的領導先驅，是與現實的統治菁英存在思想的衝突，而蘇聯解體後，「他們雖然獲得了所追求的政治與學術自由，但卻失去了相對優勢」（Lane, 1996: 539-549），因此，知識菁英在統治階層的邊緣化也影響了俄羅斯的社會層級結構的合理性。¹²

12. 俄羅斯知識菁英的邊緣化主要原因在於俄羅斯並沒有在 1991 年蘇聯解體獨立後馬上改選國會，因為當時的國會是人代會和最高蘇維埃，而人代會和最高蘇維埃在此時是支持葉爾欽的政策，甚至還授權葉爾欽進行經濟改革，故葉爾欽否決了在蘇聯解體後立即舉行國會大選；等到 1993 年 12 月舉行時，時間已經過了兩年，在 1990 至 1991 年民主運動發展時期建立起來的政黨，因為得不到活動的舞臺，幾乎都消失殆盡，其中以右派自由主義取向的政黨的損失最大。因此，若是要再精確界定俄羅斯的知識菁英，右派自由主義，如雅布羅科黨（Yabloko, Яблоко）可謂知識菁英與中間階層之代表人物。而反對力量的邊緣化，作者認為並不可直接與知識菁英和中間階層的邊緣化畫上等號，兩者可或為因或為果，此有待後續研究。

俄羅斯自獨立以來，其社會層級結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間階層 (middle class) 的匱乏，俄羅斯可以稱為中間階層的人不足 20%，¹³ 而在有限的中間階層成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小型企業主、個人經營者和擁有私有土地、較為富裕的地主，而這些本質上是屬於「傳統的中間階層」，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訴求仍屬於過去，很難理解和認同現代民主政治，而在一般民主國家，中間階層為一群曾受過良好教育和技能培訓，具有現代民主思想，或曾經投入真正的民主實踐的人們，諸如醫生、律師、教師、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 (Шкаратаи, 2009)，而他們卻在俄羅斯急遽的私有化過程中被刻意邊緣化，這顯然對於俄羅斯的民主也是極其不利的。

13. 一般而言，曾經或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俄羅斯與中國等，較喜歡用中間階層來代替中產階級，一是中產階級帶有資本主義色彩，二是中間階層涵蓋層次較廣，亦包含中產階級。關於「中間階層」，作為一種社會層級 (social stratum) 概念，一般從收入、私人財產、職業和教育、自我認定來做社會層級界定。Tat'iana Maleva 在其 2008 年俄羅斯中間階層的研究中，以三個變項，也就是收入與財產、職業與教育水準、自我認同 (level of income and material well-being; occupational and educational status, and self-identification)，來定義與交叉測量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她發現如從收入 (income) 來看，有 45% 可定義為中間階層，從擁有耐久財 (possession of durable goods) 來看，為 52%，從自我認同 (self-identification) 來看，為 30%。如從教育與職業來看，僅有 19%，如要求三個變項兼具，則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僅有 5%，而任具有兩個變項特徵，則為 15% (Maleva, 2008:21-23)。Natalia Tikhonova 則從三個標準—財產、自我認同、和社會專業地位和資源，包含一般和特殊的人脈 (material well-bei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professional status and resources, includ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human capital) 來測量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如果三個標準兼具，能被稱為中產階級的人不足 20% (Тихонова, 2008)。



圖二 統治思想 (ruling ideology)、酬庸 (spoil)v.s 實績功過 (merit) 菁英徵聘系統

資料來源：Huskey (2010:369)。

2. 統治菁英幾乎是技術官僚 (technocrats) 或技術官僚專家 (technocratic specialists) ，而非政治家 (politicians) 或政治通才 (generalists) ，技術官僚(technocrats)或技術官僚專家(technocratic specialists) 意指該人其教育背景和/或工作經驗皆是在單一專業領域，通常其專業領域是和其領導的部門有所關連。技術官僚涵蓋強力集團 (siloviki) 成員或專家，¹⁴ 包含經濟學者、律師和工程師。而政治家 (politicians) 或政治通才 (generalists) 則是指該人在擔任部長前，曾在議會、州長、共產黨、總統或政府參與選舉。

14. 有關強力集團 (siloviki) 的分析於後述。

普金政權的統治菁英幾乎在其政治生涯中並沒有選舉經驗。2008年3月的俄羅斯政府最高層的6個成員中，包含總理和副總理，只有祝科夫（A.D. Zhukov, А. Д. Жуков）擁有選舉經歷，他曾任國家杜馬議員，並曾經有一段時期在杜馬中擔任預算委員會主席。而這樣的情況也展延至較低的政府層級官員。在16位部長中，只有一位擁有選舉經歷：圖魯涅夫（Yurii Trutnev, Юрий П. Трутнев）在轉任至莫斯科中央擔任自然資源部部長前，曾任彼爾姆市（Perm, Пермь）市長，後成為彼爾姆邊區（Perm Krai, Пермский край）地方行政首長。而65位副部長中，只有10位在其早期生涯中曾有選舉經歷，5位曾為國會議員，5位或曾在地方議會、或曾任市長或地方行政首長。

表一 選舉經歷作為內閣成員跳板數量統計：比較性觀點

政府類型	國 家	內閣成員數量	曾有選舉經歷比例
議會制	德 國	13	81
議會制	英 國	18	100
半總統制	法 國	20	85
半總統制	俄羅斯	27	22
總統制	巴 西	28	57
總統制	美 國	16	59

資料來源：Huskey（2010: 364）。

註：

1. 議會制內閣成員包含總理與部長；半總統制內閣成員包含總統、總理（俄羅斯包含副總理）和部長；總統制內閣成員包含總統、副總統和部長（美國包含國務卿）。
2. 曾有選舉經歷，包含曾於地方、地區或全國選舉中當選。

3. 只有一位俄羅斯官員，副總理祝科夫曾任國家杜馬議員。而其他，除現任總理普金擁有總統直選經驗外，大多是在蘇聯末期時，在地方或地區參與選舉。而俄羅斯的內閣成員中，僅有 10% 多一點擁有在地方層次以上的選舉經驗。

從表一來看，俄羅斯的內閣成員中，擁有選舉經歷的成員比例遠低於其他國家，即使是任用技術官僚 (technocrats) 非常普遍的總統制的國家，如巴西和美國，其核心成員之無選舉經驗的比例也遠低於俄羅斯，他們考量，對於人民需求具敏感度 (sensitivity to popular demands) 與擁有公眾課責性傳統 (the tradition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的政治家加入行政團隊是可彌補純粹技術官僚背景成員的不足 (Sakwa, 2008: 879-897)。

如果從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來看，合理的社會層級結構與公平公正的社會流動機制不僅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社會的和諧進步，而且是政治民主化的社會支持力量。伊諾忍徹夫認為整個俄羅斯社會可以區分成三個政治階層：第一個階層，也就是最底下的階層，是大多數人組成的普通人口。這個階層由於成員的流動與政府幾乎斷裂，因此大部分的人民不相信政治會考慮他們的需求和期望。但他們某種程度上比蘇聯時期自由，包涵財產權和遷徙的權利。而俄羅斯在獨立的 20 年中，並沒有發展出實際的國家思想，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標是將「資訊和宣傳機構」與「資訊和宣傳的目標對象」做最大的隔離。第二個階層是一個較小的團體，通常是由聯邦或地方菁英所認為的重要經濟計劃參與者。這個團體能夠正式的運用憲法所保障的自由，但實際上他們的活動是受到嚴格限制的。第三個階層則是統治菁英自己，透過相互利益連結在一起的團體。這個團體任意建立和改變遊戲規則，結果不用負擔任何責任 (Inozemtsev,

2009: 46-47)。

由上所述，俄羅斯的政治階層出現了出現了兩個問題：其一、第一層與第三層間的很明顯的出現了斷層，因為俄羅斯的統治菁英很少是選舉出身，這意味著俄羅斯的第一階層與第三階層間缺乏流動，特別是垂直的流動，或稱菁英從社會到國家的流動（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from society to the state），這會導致國家制度除了不能回應社會主要的需求與利益外，政策的決定也不會以民眾的利益為依歸，更不用說改善施政能力而對人民負責（Scott, 1998）。其二、第二階層的構成大多是蘇聯時期的黨政菁英因為急遽的私有化而累積大量財富的「俄羅斯新貴」（The New Russians, Новые русские）- 1991年後，在俄羅斯前20的企業中，有30%的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都會在前蘇聯的國家管理部門工作過，且很多都在財政部或是在總統或政府的核心行政機關再轉入商業界（或稱pantouflage（旋轉門）方式），普金時期打擊寡頭並實施國家主義，因此，政府官員身兼企業董事會主席或執行長職務，如祖布科夫（Victor Zubkov, Виктор А. Зубков）身為第一副總理又兼俄羅斯第一大國營企業「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 "Газпром", 後文皆以Gazprom稱）董事會主席，這或許也是俄羅斯商業菁英的部分國有化的展現，而此情形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俄羅斯政府提供重點企業資金紓困，但條件是必須在其公司的決策階層中派駐政府人員監督，而第二階層的自由空間已逐漸為政府所掌握。

（二）普金政權統治菁英的派別與權力傾軋

如同普金於聖彼得堡出身的背景與生涯經歷，八年的總統生涯，普京逐漸構建起圍繞自身的統治菁英三大權力體系：強力集團

(siloviki, силовики)、聖彼得堡幫(Petersburgers, петербуржцы)、及溫和改革派(moderate reformist)。透過強力集團，普金控制了俄羅斯的憲政體系的「武力部門」(power bloc)；通過聖彼得堡幫，普金控制了克里姆林宮；而透過溫和改革派，普金得以推進其經濟改革。可以說，憑藉並操控這三大權力菁英體系，並利用彼此間的權力傾軋，普金清除了政治強敵，鞏固了政治地位，形成了非常牢固的政治權力架構，也為了維持此權力架構，中央集權的政治威權統治成了普金的政治方向選擇。

1. 普金政權統治菁英的派別

(1) 強力集團(siloviki, силовики)

強力集團並非一定是泛指「軍職官僚」(militocracy)，或是一定來自於前蘇聯軍方、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或聯邦安全局(FSB)背景的官員，雖然這些成員的比例佔有大部分，但此派系最好是理解成由核心團體現任副總理謝欽(Igor Sechin, Игорь И. Сечин)和伊凡諾夫(Sergey Ivanov, Сергей Б.Иванов)，及前聯邦安全局局長與現任安全理事會秘書長帕儲雪夫(Nicolai Patrushev, Николай П. Патрушев)所領導的政府官員與商人的非正式網絡，他們擁有類似的政治觀點、追求共同的政治議程且謀求對經濟資產的聯合控制。在此集團內，成員並非皆處於平等地位，而是有著權力層級，其結構可形容為一個同心圓，依經驗資深、政策影響、和對原物料資源和相關單位的控制程度，區分為最內部的核心團體(謝欽、伊凡諾夫和帕儲雪夫等)，第二層為伯格丹欽科夫(Sergey Bogdanchikov, Сергей М. Богданчиков)和車爾科索夫(V. Cherkosov, Виктор В. Черкесов)與邊際的次團體(較為流動性，如烏斯欽諾夫(Vladimir Ustinov, Владимир Устинов))，或較小的政務官，多為總統總統

全權代表、州長或地區執法部門的首腦，實現其對地方事務的控制（Bremmer and Charap, 2006: 86-87）。¹⁵ 在強力集團的幹部群，又分為兩個主要團體，一個主管俄羅斯內政，如現任副總理謝欽（Igor Sechin, Игорь И. Сечин），一個則管理國際與國家安全事務，包含前國防部部長和現任副總理伊凡諾夫、國內安全、緊急狀態和天然災害部長紹伊古（Sergey K. Shoigu, Сергей К. Шойгу），前聯邦安全局局長與現任安全理事會秘書長帕儲雪夫、前聯邦總理和現任對外情報局局長弗拉德科夫（M. E. Fradkov, М. Е. Фрадков）、與現任外交部長拉夫洛夫（Sergey Lavrov, Сергей В. Лавров）等（Kryshtanovskaya and White, 2005: 1069-1071），可以看見，強力集團是三個權力菁英派系中，力量最為強大者。檢視俄羅斯的內閣政府官員，克魯史坦諾夫斯卡亞和懷特（Olga Kryshtanovskaia and Stephen White）在 2003 年的研究中指出，官員中有著武職（軍警）（uniformed services）背景的人數有持續性的增加（Kryshtanovskaia and White, 2003: 294）。2008 年的 26 個俄羅斯政府內閣成員中，有 7 位，大約是 27%，在其早期生涯曾擔任武職。再者，這些俄羅斯菁英的經歷都持續反映出蘇聯時期統治的遺產，如運輸部，就帶有強烈的軍方色彩，而運輸部長列維欽（Igor Levitin, Игорь Левитин）就被認為是強力集團派系成員。再者，該集團派系除了對軍事、武

15. 伯格丹欽科夫於 1998 年開始擔任 Rosneft 負責人，2004 年後接任 Sibneft 負責人；2008 年 5 月 12 日總統梅德維傑夫解除車爾科索夫（V. Cherkosov, Виктор В. Черкесов）擔任控制流通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藥物國家委員會（State Committee for the Control of the Circulation of Narcotic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主席的職務，可是，之後總理普金卻指定他擔任聯邦採購軍事和特種設備署（Federal Agency for the Procurement of Military and Special Equipment）署長；烏斯欽諾夫曾是葉爾欽的權力菁英，曾為俄羅斯司法部長，現為南方聯邦區總統全權代表（Plenipotentiary Envoy to the Southern Federal District），早已投靠「強力集團」，在對俄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打擊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力的、司法部門的控制外，其成員也遍佈政府主要機關領導，如原子能署 (Energy Agency, Агентства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關稅局 (Customs Service,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且對聯邦資產基金 (Federal Property Fund, Российский фонд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 和金融監管局 (Financial Monitoring Service, Службы по финансовому мониторингу) 有著一定的影響力。

(2) 聖彼得堡幫 (Petersburgers, петербуржцы)

他們來自聖彼得堡，是普金的舊識、校友或昔日同事；他們同強力集團一樣效忠於普金，但他們一般沒有軍警的出身，大多為技術官僚 (technocrats)。他們是普金所建構的第二大權力派系，也是普金用來平衡、制約強力集團勢力的主要力量，包含曾任克林姆林宮幕僚長和第一副總理的現任總統梅德維傑夫，曾任克林姆林宮副幕僚長、聯邦政府秘書長和南方聯邦區全權代表，現任副總理柯札克 (Dmitriy N. Kozak, Дмитрий Н. Козак) 等。

(3) 溫和改革派 (moderate reformist)

他們主要是一群技術官僚，因為相同或相似的經濟改革主張而成為一派，是普金推進經濟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主要人物包含現任副總理和財政部長庫德林 (Aleksey L. Kudrin, Алексей Л. Кудрин)、前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長，現任俄羅斯儲蓄銀行董事會主席格列夫 (German O. Gref, Герман О. Греф)。他們是屬於關鍵經濟人物，尤其是建立石油「穩定基金」的庫德林，對 2008 年金融海嘯期間，恢復俄羅斯經濟、穩定國內金融動盪發揮了突出作用。這些溫和改革派的經濟改革理念與普金的需求相符，他們的改革是一種漸進的、溫和的、「有俄羅斯特色」改革；是要建立一種「有秩序、可控制的市場經濟」，加強國家總體經濟掌控，而這也是普金的改

革著主張。

2. 統治菁英權力傾軋

普金雖出身聖彼得堡，也是會任用莫斯科當局的固有菁英，如檢視 2008 年的 86 位俄羅斯政府官員（包含總理、第一副總理、副總理、部長和副部長），顯示將近一半，或 47% 的官員終其職涯皆在公部門做事。而 20% 的官員其職涯皆奉獻在同一部門，集中於農業部、國防部、保健與社會發展部及運輸部。沒有擁有公務生涯經歷或選舉經驗，但卻擁有學術地位的官員佔 14%，而 20% 曾在其早期生涯中投身商業界，而在其學術或商界機構和政府特定部門有緊密連結（Huskey, 2010: 363-365）。

但即使如此，普金仍然較為信任自身所培植的統治菁英，特別是強力集團和聖彼得堡幫（Huskey, 2009: 253-272），他不僅利用統治菁英的權力派系來鞏固自身的權力地位，也利用統治菁英間的派系鬥爭和權力傾軋來作菁英權力派系的相互制衡，以免統治菁英派系過份坐大，更甚者，也以統治菁英來權力制衡統一俄羅斯黨（Levitsky and Way, 2006: 199-216）。我們可以從三個事件來觀察普金操縱統治菁英的政治鬥爭，藉而來分析普金的菁英權力制衡與權力槓桿政策。其一、是自 2004 年以來，國營企業「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 Роснефть 後文皆以 Rosneft 稱）和「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的內鬥，其二、為 2004 年弗拉德科夫接任總理，其三、為 2007 年底普金提名梅德維傑夫擔任總統。茲分述如下：

其一、Rosneft 和 Gazprom 為普金最為倚重的兩個國營企業，2004 年，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Rosneft）取得尤科斯（Yukos, ЮКОС）石油公司最大的子公司尤甘斯克公司（Yuganskneftegaz, Юганскнефтегаз）的控股權。雖然普金一度認可要將兩個企業合併，

成為一個壟斷企業，但也許考慮到此合併後的壟斷企業過於龐大，一旦失控，將危及普金的經濟命脈。因此，藉由兩個統治菁英派系 - 強力集團和聖彼得堡幫的既得利益競爭，當時的克林姆林宮幕僚長（現任副總理）謝欽掌控 Rosneft，當時的第一副總理梅德維傑夫（現任總統）為 Gazprom 董事會主席，兩者競爭的結果，Rosneft 藉由一些精明的策略，包含利用一個未知名的龍頭企業在拍賣中購買尤科斯主要的資產而逃掉了被 Gazprom 吸收的命運，這使這兩個國營企業保持分離狀態，也加深了強力集團和聖彼得堡幫間的權力傾軋。

其二、弗拉德科夫為強力集團的核心幹部，而 2004 年普金提名弗拉德科夫為總理，有兩大用意，第一、普金為了消滅葉爾欽政府寡頭菁英的勢力，尤科斯事件導致克里姆林宮內部的分裂，而現任總理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 М. М. Касьянов）支持霍多爾科夫斯基，引起普金不滿，因而在 2003 年國會選舉後，提前在政府提出總辭前，提名弗拉德科夫為總理。第二、「統一俄羅斯」黨群眾支持率也在普金的支持下，遠遠高於其他政黨，由於其在國家杜馬中的第一大黨的穩固地位，「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可以確保總統和政府的決策在議會中得以順利通過。「統一俄羅斯」黨雖然力圖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執政黨，但是當時普金並沒有授權「統一俄羅斯」黨組閣，而是提名原俄羅斯聯邦駐歐盟代表弗拉德科夫為總理，這其實也是間接地鞏固總統權力，不願權力下放議會，限制了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也間接制衡了統一俄羅斯黨的權力（許菁芸，2010：138）。

其三、普金於 2007 年 12 月 11 日，距離下屆總統大選提名登記不到幾天的時間，才宣布梅德維傑夫為下任總統候選人，這樣的時

機選擇與提名人選，對於普金於第二任總統任期期滿後的未來鋪路是極為有利的。於時機選擇方面，無論是全球或本地媒體鎂光燈在此時皆聚焦在普金一人身上，猜測他是否會為了保有總統職位，做出修憲選擇或是與白俄羅斯合併，雖然在最後關頭，普金提名了梅德維傑夫，卻也讓普金個人的光環完全蓋過梅德維傑夫，縱使他順利當選下屆的總統，卻也只被認為是普金作為 2012 年再任總統的暫時替代人選，其政策也只是普金意志的延續。於提名人選方面，普金並非提名統治菁英派系中勢力最強的強力集團成員擔任總統，而是提名勢力次之的聖彼得堡幫、文人出身的梅德維傑夫，這權力制衡的意味非常的濃厚，而且這也代表著如果梅德維傑夫不甘心只是當個沒有實權的總統，他與普金的中間，還屏障著一個勢力強大、武職軍事官僚的強力集團有待跨越。

(三) 資源型經濟 (resource based economy) 對於統治菁英鞏固權力層級與政治威權的推波助瀾

2006 年 OECD 將俄羅斯經濟發展模式定義為資源型經濟 (Resource Based Economy)，此種經濟發展模式也許短期可拉抬俄羅斯整體的經濟成長，但如果沒有仔細規劃其未來發展，對長期經濟發展而言，反而會成為其他非資源產業的絆腳石且會使經濟成長趨緩，甚至停滯。

資源型經濟存在著不少潛在型風險，一是總體經濟風險，國內經濟成長容易受外在環境衝擊影響，如果國際價格的劇烈驟降，可能會引起財政赤字，而舉借外債。二是「荷蘭病」(Dutch disease)

風險，¹⁶ 能源產業對資金與勞動力產生虹吸效應，牽制了非能源產業，尤其是民生工業的發展。三是特有的制度風險，由於龐大的自然資源利益驅使，資源型經濟國家政治環境多為動盪，常有叛亂或內戰產生，也由於大量的能源出口常伴隨著貪污舞弊，和所得分配不均與貧富差距拉大，長期而言，容易導致經濟成長趨緩或下降（Ahrend, 2006: 5-15）。

從 2003 年以來，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出口一直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額的 20% 以上、國家總收入的 30% 以上（僅稅收就佔 24%），聯邦預算收入的一半以上和國家外匯收入的近 55%，工業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РФ, 2008）。俄羅斯依靠石油出口獲得了可觀的額外收入，不僅使俄羅斯政府提前償還了 IMF 的全部債務，還如期償還了巨額外債，補發了拖欠的工資，增加了固定資本投資，提高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可以說，石油收入增加是俄羅斯近年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但，嚴格來說，石油、天然氣及金屬礦產並不是驅使俄羅斯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能源領域的數值增加並不是實際 GDP 成長的一個主要因素，不過這其實不令人訝異，因為俄羅斯天然氣產量（生產）幾乎已經停滯，而且雖然石油產量成長在 1999-2004 年成長速度驚人，但現在卻是慢如牛步，另外，石油及天然氣工業雇用的員工比例遠人口少於鐵路公司（小於 2% 的勞動）。因此，真

16. 1970 年代，荷蘭發現了天然氣，來自國外龐大的需求讓荷蘭的能源產業欣欣向榮，也因為這個龐大的需求，導致外資大量購買荷蘭幣，使荷蘭幣升值。與蓬勃發展的能源產業相反的是，因升值而失去競爭力的其他出口產業。能源產業的一枝獨秀，並不能彌補其他產業的受傷，導致了大量的失業人口，經濟也受到損害。現在荷蘭已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因天然資源引起的效應，然稱為「荷蘭病」（Dutch Disease）。

正驅使這些工業收入成長的原因在於石油出口至歐洲的價格急速飆漲，同時這些收入滿足了國家預算（因為有「穩定基金」的幫助，部分財政挹注得以收回）、個人收入及公司收益。但，卻也導致俄羅斯現在或未來要面臨的許多問題。

資源型經濟導致俄羅斯主要的問題之一，在於俄羅斯的資源型經濟是樹立在國家的安逸與惰性上，由於石油美金的熱錢急速湧入，從事對社會與經濟有益活動的人數正在急速下降。而同時，所謂政治菁英的數量卻持續上升，可以推測，當經濟惡化，國家將難抑制這些菁英的欲望，尤其是這些菁英中有許多是構成普金政權的權力階層。

問題之二、俄羅斯倚重原物料資源出口的經濟，無論是資金或人員上，已對其他產業造成虹吸效應，事實上，俄國根本無法與低工資的亞洲國家製造商抗衡，即使憑藉著過去在軍事相關以及高科技領域的優勢（如太空科技），國內工業輸出成長與相應的進口業成長相比已經大幅衰弱。這不禁令人想到俄國是否已感染了所謂的「荷蘭病」（Dutch Disease），一些經濟學家將此病稱為「天然資源的詛咒」，而且此病帶來的併發症，則是貪污的盛行，因為姑且不論是私人產業或是國營產業，這些既富有又強大的天然資源公司，提供了一個貪污的溫床，經濟成長可以輕易地為政治菁英所控制。

問題之三、俄羅斯於 2003 年將原物料資源全部收歸中央所有，將之定義為「戰略部門」，而俄羅斯政府干預的結果之一，就是石油製品與天然氣的生產量及出口成長的下降。尤其是天然氣，還需從中亞進口再出口至西歐以達到所提供的供應量。再者，俄國堅持出口用管線必須被國營的「石油運輸管道公司」（Transneft,

Транснефть，後文皆以 Transneft 稱）所控管，其管線的供應力限制了出口量，且限制私人企業提出建造新管線的計畫，另外也增加賦稅。俄國政府的能源戰略部估計俄國總石油的生產量在 2020 年前成長緩慢，因此日後的石油獲利將來自於國際價格的持續上升。而目前無法假設石油價格在長期會持續上漲，不過它會維持在一個歷史高幅數年，但由於俄羅斯的石油產量無法大規模提升，因此不會刺激收入，只有如此才不會損害俄國經濟成長，因為石油美元的收入，有極大部分編入「穩定基金」。

2009 年後，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的影響開始強烈顯現出來，經濟狀況的惡化自然帶來了政治上的效應，普金作為政府總理成為批評的焦點，反普金的遊行示威也在一些城市出現。但令人詫異的是，普金雖然支持度略降，卻依然受到俄羅斯民眾擁戴，甚至因為金融風暴之故，梅普政府更可以國家重點紓困之因應措施來強化對地方、媒體和金融企業的控制，並以多年來油價高漲所累積之「穩定基金」來援助前蘇聯國家經濟，藉此緊密前蘇聯國家經濟空間之掌握（宋鎮照等，2009：211-212）。

基於國家、民族、乃至於個人的強大利益，隨著原物料能源的升高，俄羅斯對原物料礦產能源出口的依賴不斷增加，俄羅斯愈來愈希望徹底將源物料礦產能源利益集中於聯邦中央，因此，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成了普金與其統治菁英的不二抉擇。

四、俄羅斯民主抉擇

檢驗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對俄羅斯的統治菁英而言，民主只不過是一種政體的形式，是一種達到更進一步目的的手段。民主本身

並不是終極目的，因此也可以為了終極的目的（例如民富國強）而加以修正（吳玉山，2009：203-204）。而對於俄羅斯人民而言，由於自 1991 年蘇聯解體後，政治經濟的動盪導致人民極度渴望安定、渴望秩序，甚至認為秩序可凌駕於民主價值，¹⁷ 因此，人民的渴望成了統治菁英操縱民主的工具，故，俄羅斯人民的民主抉擇，也可說是被動的民主抉擇。

俄羅斯在獨立之前，也就是在前蘇聯時期，雖然冠以聯邦制國家之名，實際上卻是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開始民主化道路，葉爾欽執政初期，民主治理與自由市場經濟謂為一時風潮，但隨著震撼療法的失敗，經濟的動盪與 1995 年底之國會選舉與 1996 年之總統大選，為了維持其政權合法性，迫使葉爾欽放緩經改的方向。而 2000 年普金執政後，卻因政權日趨穩定，而漸進地改革中央與地方機制，將之前下放的權力又回歸到中央，而在政治體制上從民主治理，轉而走向表面上稱之為「主權民主」，實質上中央集權之國家統治。在 2008 年梅德維傑夫當選總統後，也延續了普金的中央集權政策。

而俄羅斯民主之根本問題點，不是如同歐美民主制一般在於審視民主化之程度，將民主制度視為「歷史的終結」，為普世價值，而是認為民主只是在實質上是否增進國富民強之工具的問題上，如果不是，那民主僅能成為俄羅斯國家主權論（statism）在憲法層面上裝飾價值而已。再者，俄羅斯的經濟成長並不是由於經濟有效率的運作所致，而是因為原物料資源價格上漲所帶動，而普金政權的

17. 在「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Levada-Center,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Левада-Центр））2011 年 1 月 18 日公布有關「秩序或民主？」（Order or democracy?,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民調中有 56% 的人民認為要達成秩序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違反民主原則和限制個人自由。」，見第三章第（二）部分。

權力層級也是拜快速飛升的經濟所鞏固，因此，普金政權的菁英們皆致力於原物料資源的掌握，以中央集權方式穩固自身的權力層級，至於民主的考量只會在自身權力需要加持時，才會訴諸民主的裝飾（Inozemtsev, 2009: 40-60）。因此，對於俄羅斯民主抉擇之理論建構，首先要確定影響俄羅斯民主抉擇之變項，也就是聯邦經濟發展（包含整體 GDP 的持續成長與原物料能源的價格成長）和政權合法性。

變項一：經濟表現與原物料能源價格

政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著重於經濟表現對政權穩定的影響。對此，吳玉山認為只要經濟表現良好，專制政權便無需擔心其體制的穩固性，也無需從事任何體制改革（吳玉山，1998：446-447）；若是實施經濟改革的成效不彰，反而會讓人民質疑中央集權化對經濟發展造成束縛，危害政權的合法性。另政治穩定理論認為民主為一種工具，是達到豐裕物質生活的手段，因此僅具有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

2006年OECD針對俄羅斯高度依賴能源出口的經濟模式發表了看法，將俄羅斯經濟發展模式定義為資源型經濟（Resource Based Economy），根據OECD的定義，資源型經濟係指自然資源產出佔GDP的10%以上，佔出口40%以上的經濟。當原物料價格經常波動，進口收入相當倚賴國際價格時，也正隱含著資源型經濟國家對於外在環境的衝擊是相當脆弱的（Ahrend, 2006）。因此，資源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油價和資源原物料出口是近年來俄羅斯經濟成長的關鍵，俄羅斯經濟波動與國際油價上漲有著明顯的關聯性。而為了徹底掌握原物料資源，中央集權是當權者的掌控之道。

變項二：聯邦政權合法性(或為正當性) (legitimacy of political regime)

李普賽 (Lipset) 對合法性之解釋，認為政治系統是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 (Lipset, 1959: 78)。換言之，任何政治系統若具有能力形成並維護一種使其成員確信現行之政治制度，對此也是該社會最為適當的信念，那麼便具有統治的合法性。因此，政治權力合法性，指的不是法學意義上的合法性，而是指公眾對於政治統治與體制的認同，它對政治權力體系有著重大的意義，為有別於法律上之合法性，因此不少學者將 legitimacy 譯為正當性。一般說來，政權正當性程度越高，則政治權力的效能就越大 (邱芝、范建中，2009：7)。

隨著正當性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析概念，許多研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概念並將其運用到超國家制度安排的研究之中。因此，目前有關正當性的研究，大多還是集中於超國家制度，尤其是對歐盟的研究。

何瑞特 (Marcus Horeth) 認為政權正當性主要有來自三種不同的來源：一是「輸出」的正當性 (output legitimacy)，主要衡量政府政策之效率與有效性；二是「輸入」的正當性 (input legitimacy)，即通過民選的議會獲得直接的民主正當性，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擴大公民參與和諮詢權；三是成員「借與的」正當性 (borrowed legitimacy through Member States)，即通過國家或組織成員及其具有正當性地位的權威結構 (如成員國政府、議會、政治菁英) 讓渡權限來獲得 (Horeth, 2001: 8-9)。正當性的增減就依賴於上述諸種合法性來源的博弈結果，即民主治理、政策績效和成員國的自主權三方相互角力關係，來尋求維持制度的正當性。成員國的自主權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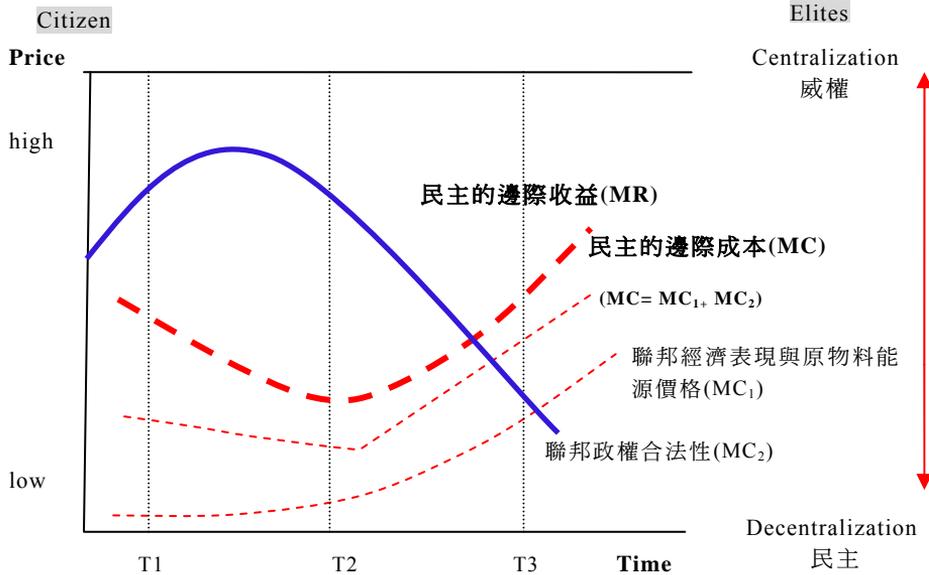
導著治理的有效性和正當性的增減，有效性和正當性又是相互制約的關係—即政策有效性的增強，一方面會通過「輸出」的途徑來提升政權正當性，但另一方面又會簡化決策程序、提高決策機構的獨立決策能力，而這相對地會侵害了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的政權正當性（Larsson, 2005: 118）。

本文將政權正當性試圖運用到俄羅斯民主抉擇之探討，並將政權正當性作為統治菁英的民主抉擇的可控制變項，強調在俄羅斯聯邦獨立之初，實施民主化，而為防止國家分裂，就和各個聯邦主體個別簽訂雙邊的聯邦條約，其性質就如同在國家的框架內，卻出現各個主體簽約讓渡權限予中央（借與的正當性），有超國家制度的設計，並開始總統與議會的民主選舉（輸入正當性），但，由於國家剛成立，加上政治經濟動盪，因此政策績效不彰（輸出正當性），因此可見，葉爾欽時期，民主治理與成員自主權是其維繫其政權的主要來源因素。但，在普金時期，整體政權正當性來源大翻轉，政策績效成為其主要來源因素和可控制變項，而去壓抑了民主治理與成員自主性的空間（許菁芸、宋鎮照，2011：6-8）。

（一）俄羅斯民主抉擇模型之建構

針對俄羅斯民主制度的特殊現象，也就是名義上是民主國家，但在普金時期卻漸行中央集權之實，或稱中央再集權（recentralization, р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Гельман, 2006: 90），在此試圖解釋此現象而設計出整體的研究架構（如圖三所示）。本研究架構之前提，也就是普金政權對於民主之前提假設，即是人民也不具民主政治的概念，民主只是政權穩定工具，俄羅斯的領導中央自始至終皆是往中央集權單一制發展。

本研究架構(圖三)首先套用經濟學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 簡稱 MC)和邊際收益(marginal revenue, 簡稱 MR)概念,把政府視為一個理性的行為者 - 如廠商,廠商的生產計畫是依據邊際報酬與支出結構而定,當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時,廠商願意繼續生產,若邊際收益小於邊際成本,廠商會放棄生產。以俄羅斯國家行為來看,俄羅斯自從獨立後,雖然實施民主化,但當統治菁英維持民主體制所需付出的成本小於其收益時,國家會持續民主體制;反之則會逐步放棄民主體制,選擇中央集權。因為很難實際去量化俄羅斯政府之政策考量,故,這是一個概念性的政治模型運作,也就是設定當民主之 MR 線往上,MC 線向下,俄羅斯的民主化會持續,俄羅斯中央(圖二右方顯示政府政策作法,而政府政策是以賦予的民主成本作為考量)會以地方分權與民主選舉來增加人民支持度。而當民主之 MR 線往下,MC 線往上,俄羅斯政府會趨於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而俄羅斯普金政權一直以來就是要集中所有的權力資源以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因此俄羅斯之民主抉擇模式,是與一般國家的民主化進程背道而馳,其民主的成本根本上是俄羅斯中央所賦予,其經濟的發展程度反而是成為其鞏固中央集權的有力變項。中央政府則會強化自變項的運作,來增民主的成本,而來貫徹其自始自終不變的目標:即維持一個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許菁芸、宋鎮照,2011:9)。



圖三 俄羅斯民主體制維繫之邊際成本與效益分析概念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從圖三來看，俄羅斯民主政體的邊際成本有兩個來源（ $MC = MC_1 + MC_2$ ），其一是聯邦經濟表現和原物料能源價格（ MC_1 ），當國家之經濟表現穩定，國內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上升，增進社會繁榮和人民生活富裕，將可進一步的中央集權化。而俄羅斯的經濟表現（如圖三所示）一開始呈現為斜率較為負的直線，而突然轉折為斜率較大的直線，其拗折因素為自2000年以後，石油價格大漲，俄羅斯的經濟由於石油美金的大量灌注，經濟快速成長與復甦，而此代表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民主的邊際成本將急速上升。而經濟表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趨緩，經濟結構問題浮現，影響著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但因為國際能源價格仍高居不下，

原油價格仍持續高漲，故經濟表現曲線（MC₁）之後半段仍維持直線。¹⁸

民主之邊際成本的第二項要素是政權之正當性（MC₂），西方所倡導之民主體制，在俄羅斯的民主化過程中，首先經歷的卻是民主體制所擁戴的市場經濟所主張之震撼療法造成的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而使得中央政府正當性低落，人民對政府的支持度驟降，地方與中央呈現了緊張狀態，地方開始和中央談判，成員的自主權與國會的民主治理左右了政府的政策的績效，而在普金時期，隨著中央集權的強度增強，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地增加，民主治理與成員自主權被相對制約，此措施使得政權正當性升高。因此，當民主之邊際成本增加時，政權正當性便會成為自變項，也是政府可以有效運作的可控制變項。但是當政府以政策實施來增強政策績效而制約民主治理與成員自主權時，也僅能漸步實施，不能急功求利。因而呈現出在圖三的變化，就為一條坡度較為和緩的凹形曲線。

在民主的邊際效益（MR）方面，在俄羅斯獨立初期，政府運用民主統治來施行政治與經濟事務，由於人民對於西方民主的期待，加上西方對於俄羅斯民主化的高度讚揚與援助，起初邊際效益是遞增的，但是隨著經濟的衰退，國家機器在政治與經濟民主化進程中，無論是國會或政黨都出現無力之窘境時，公部門出現越來越多貪污腐敗的情況，使得民眾對政府心生不滿，同時政策的完成度也會下降。再者，1996年的總統大選，葉爾欽面臨人民支持的窘境凸顯了中央實施民主與自由經濟的危機（MR線向下之轉折點），而在2002

18. 固然在經濟起飛時期，經濟可以大幅度成長，但不能長久持續，所以經濟成長速度在經濟體系逐漸成熟後會成長趨緩，甚至有下滑的趨勢，但此涉及俄羅斯聯邦的經濟發展未來，並不在此文之探討範圍，故圖三並未繪出。

年後油價逐步上揚，中央政府在得利於國家能源價格上漲後，經濟表現和經濟發展程度增強後，普金政權實施中央集權後，反而因為中央集權體制的政令貫徹度很高，有助於提升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因此邊際收益會隨著政策達成的效果而顯著增加。從圖三所示的 MR 曲線走勢來看，當投入的資源到達飽和時，在最高點之後，則會出現經濟學上所稱的「邊際效益遞減」現象，表示實施民主的困難度提升，導致每單位收益遞減。

以下用成本效益分析途徑，說明俄羅斯統治菁英之民主抉擇的過程：

1. 在俄羅斯獨立初期，葉爾欽開始政治與經濟民主化，政治與經濟的開放，人民對民主的期待，加上政府希望藉由經濟改革獲得經濟成長，因此，政府與人民對民主政治的需求上升，因此圖一的 T1 初期表示民主政權的邊際效益上升，邊際成本下降，民主進程持續 ($MR > MC$)。在 T1 中期-T2，俄羅斯震撼療法的威力展現，經濟大幅衰退外，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高漲，民眾認為民主與自由經濟所帶來的並不是富有，而是痛苦時，民主體制受到質疑，但，葉爾欽仍持續經濟改革路徑。而在國會選舉與總統大選前後，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政府的立場時常改變，分裂的民意和分立的府會，總是造成俄羅斯的總體經濟政策顛簸擺盪，時緊時鬆，選舉前後保守緩進，經改就會停滯，選舉之間隔期間大步向前，激進改革（吳玉山，2000：201-202），因此，政策朝令夕改導致政策績效低落，更由於國會與政黨的弱勢，無法為人民申張權利，相對政策也不彰，人民根本不信任國會與政黨的機制，也間接地表現出對民主的質疑。雖然，此時民主的邊際效益仍然大於邊際成本，但是差距越來越小 ($MR - MC \geq 0$)，民主在這個階段面臨了虛化的危機。

2. 在 T2 階段，普金開始執政，便開啟了俄羅斯自 1999 年經濟高度發展。在此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 1998-2002 年，為 1998 年金融風暴導致的盧布大幅貶值效應，帶動國內生產與出口商品之增加，第二階段為 2003-2008 年，因為國際油價的上漲，帶動了俄羅斯整體經濟的成長，高度依賴能源出口型經濟發展模式累積鉅額的外匯存底。俄羅斯經濟波動與國際油價上漲有著明顯的關聯性，也因為國際能源價格的高漲，不僅有助於俄羅斯經濟成長，同時在徹底有效地掌握油氣能源，也成為中央再集權的重要動力與誘因。

而從民眾對政黨與國會的持續失望下，政治與社會脫節的情況下，政府結合東正教團體鼓吹愛國主義，此時民主的邊際收益 (MR) 開始出現遞減現象。而普金八年來，為鞏固自身權力而實施強化中央集權措施，如果套用政權正當性 MC2 的來源 (輸入、輸出與借與) 模式，為了避免民眾對政府干涉人民自由意志的情況產生不滿，他努力地加強政策績效，在第一任期內制約成員的自主權，第二任期加強制約民主治理，而這些策略與措施搭配上強勢的經濟發展 (MC1)，當然總統大選與議會權力黨 (Party of Power,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的勝利也增強了聯邦中央的政權正當性 (Söderlund, 2005: 521-522)。¹⁹ 因此，民主的邊際成本大於邊際效益 (MR < MC)，政府的中央集權政策實施無礙。

19. 「權力黨」是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出現的特有現象，它不是執政黨，而是受制於總統，是執政者的支撐力量，實施執政者的政治意圖，在傳統俄羅斯的總統內規中，俄羅斯總統是獨立於政黨，不加入任何政黨，政黨 (即使是議會中的最大黨) 卻無法成為執政黨，沒有組閣的權力，因為負有組閣任務的總理人選掌握在總統手中。「權力黨」與權力當局的關係是互惠的，執政者為確保權力的穩定，通過其在議會中的議員代表使執政者的決策合法化，與此同時，「權力黨」也能從執政當局得到有利的資源，確保本身的地位 (Коргунюк, 2001:19)。

3. 在T3 階段，2008 年對於俄羅斯聯邦政治而言，也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年，俄羅斯於 2008 年 3 月 2 日舉行總統大選，強勢總統普金結束了八年的執政，取而代之的是提名支持梅德維傑夫擔任總統候選人，並於總統大選後轉任總理。而普金在 2008 年 5 月就任總理的前夕，也同意擔任俄羅斯國會大黨統一俄羅斯黨的黨主席，這也是俄羅斯國會首次出現有執政權力的政黨。²⁰ 綜觀 2008 年至今的俄羅斯經濟，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全球需求不景氣、日用品價格下跌、以及信貸緊縮威脅企業生存等，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簡稱Rosstat，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簡稱Росстат）資料，自 2008 年第四季起俄羅斯的GDP增長率，從 2007 年同季的 9.5%降到大約 1.1%，2009 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開始呈現負成長（宋鎮照等，2009：204-206）。因此，MC1 開始呈現平緩走勢，代表著聯邦中央對聯邦主體的強勢作為開始會出現些許鬆動。

但是，隨著原物料能源價格的升高，俄羅斯對原物料礦產能源出口的依賴不斷增加，俄羅斯聯邦中央愈來愈希望能徹底掌控原物料、礦產和能源利益，以提高聯邦中央的支配權力。如 2004 年開始，俄羅斯政府轉向國家主權主義（statism）（Hanson, 2007: 879-883），鎖定控制「戰略」（strategic）部門，²¹ 特別是原物料部門的石油。而且俄羅斯中央政府堅持所有的出口輸送管都必須為國營企業 Transneft所控管，也凍結了私人企業建造及管理新輸送管線的申請（宋鎮照等，2009：223）。再者，2005 年國家杜馬通過，2006 年

20. 統一俄羅斯黨—此權力黨目前還不能直稱「執政黨」，雖然在「梅普體制」下，普金普遍被認為是實際的執政者，但是總統梅德維傑夫是否日後會掌握政權，仍是未知數，而總統依循俄羅斯慣例，沒有加入任何政黨。

21. 除了石油和天然氣外，現在更逐步擴大到銀行和國防相關工業。

生效的新「礦產資源法」(New Mineral Resources Law) 明確規定礦產資源只歸聯邦中央所有，並取消了地方政府批准和監管自然資源開發的權力，此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因此，由此可以預見，俄羅斯統治菁英的中央再度集權政策在未來仍將可能持續 (MC>MR)。

(二) 檢驗俄羅斯民主抉擇之社會反應

俄羅斯的權力菁英，尤其是強力集團，其核心價值為法律、秩序和穩定高度優先於民主和公民社會，並且是經濟民族主義者，認為國家的自然資源是屬於俄羅斯民族，並且提倡俄羅斯應該重返國際的大國地位 (Bremmer and Charap, 2006: 88-90)。這樣的想法透由經年累月的媒體控制與社會運作，卻也讓人民去接受秩序高於民主價值。

根據 2011 年 1 月 14 日「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Levada-Center,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Левада-Центр)) 公布有關「俄羅斯人對國家現況的評價」(Ситуация в стране по оценкам россиян) 的民調中 (見表二與表三)，從表二得知，有 33% 的人民對普金和其統治菁英的作為抱持肯定，認為國家目前的走向是為了整建秩序，只有 11% 的人認為是為了建立獨裁政權，但更少的人 (9%) 認為是為了建立民主。

再者，如果從表二自 2005 年至 2010 年底的長期發展趨勢來看，人民對普金和其統治菁英的強勢作為逐年增加與肯定 (至 2009 年)，但在 2010 年卻起了一些變化，變化的比例在於「整建秩序」和「增加混亂，無政府狀態」中的比例互為增減，作者認為，此變化的原因在於梅德維傑夫與普金間的權力傾軋逐漸浮現檯面，兩者對於經濟政策與國家走向出現差異，導致置權力菁英間也蠢動不

安，而使得兩者的選項（「整建秩序」和「增加混亂，無政府狀態」）比例變動。但，即使在這樣的政經環境中，33%的人民是仍然認為國家的走向是整建秩序，為所有變項中比例最高。²²

表二 您認為目前國家的走向為何？

單位：%

	2005.05	2006.12	2007.11	2009.12	2010.12
建立獨裁政權	7	8	13	11	11
整建秩序	22	30	42	42	33
增加混亂，無政府狀態	43	30	14	19	28
建立民主	11	12	15	9	9
難以作答	17	21	15	20	19

資料來源：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b)。

此外，從表三得知，超過一半的俄羅斯人（57%）傾向認為總統應該協調政府、國家杜馬和司法系統的活動。而傾向認為應該三權分立的俄羅斯人僅佔22%，而這顯示了，有極大比例的公民認為一個強而有力的總統是必要的。且需要一個強勢總統的數據2006年（62%）高於2010年（57%），這是否可以認為，俄羅斯人民認為普金的總統任內作為勝於梅德維傑夫，此或許有待觀察。

表三 您認為何種體制對俄羅斯較好？

22. 雖然有近2成的民眾認為難以作答，但如果觀察俄羅斯的普遍民調可以發現，在各種民調，只要是關於政治或政府的部分，大約都是兩成的民眾都是持難以作答的答案（表二、三、四皆是），因此，這樣的情況是否可以解釋為大約有兩成俄羅斯人民對於國家、政府，甚至人民的前途是迷惘，或是漠不關心，亦或是無力感，此有待後續研究觀察。

單位：%

	2006.12	2010.12
俄羅斯總統、國家杜馬、司法系統三權分立	18	22
俄羅斯總統聯合、協調政府、國家杜馬和司法系統活動	62	57
難以作答	20	22

資料來源：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b)。

再者，在「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Levada-Center,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年1月18日公布有關「秩序或民主?」(Order or democracy?,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民調中(見表四)，超過半數的受訪者(56%)表示偏愛秩序，受訪者甚至毫不遲疑認為，要達成秩序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違反民主原則和限制個人自由。」，23%俄羅斯人認為民主較為重要，而這些回應在俄羅斯各階層人口分佈如下：認為秩序較為重要大多反應在低收入公民(71%如此回答的公民歸類自己是在於無法負擔糧食支出之列)，而其他三分之一小康的俄羅斯人較為偏愛民主(31%)。而在民主的認定方面，35%的俄羅斯人認為民主就是言論、新聞和信仰的自由，而29%的人認為民主就是社會秩序和穩定的保證，27%則將民主認為是經濟繁榮國家的同義詞。36%認為秩序不能缺乏民主，但卻有13%的人認為秩序與民主是互相矛盾的。

雖然從表四來看，1998-2010年的長期發展趨勢來看，儘管偏好秩序比例始終高於偏好民主比例，但，自2000年以來，可以看出俄羅斯人對秩序的偏好明顯降低，而對民主的偏好逐漸增加，且，2010

年是俄羅斯人歷年來相對對秩序偏好最低，而對民主偏好最高的一年。但，如果認定關於人民對秩序偏好下降與民主偏好上升，就認定俄羅斯人民抉擇未來走向會偏好民主，此又過於武斷。作者認為這樣的起伏與國內的政經環境變化有高度相關，2000年普金從代理總統正式經由總統大選成為總統，在其執政期間，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趨於秩序與穩定，隨著人民安定生活的需求被漸漸滿足後，人民對於秩序的偏好降低，此為理所當然之現象。同理可循，自2003年起，隨著原物料價格的飛漲，2003年8月28日俄羅斯聯邦政府批准通過第№ 1234-R號「俄羅斯2020年前能源戰略」(Russia's Energy Strategy to 2020;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又稱「俄羅斯能源戰略」，俄羅斯政府轉向國家主權主義 (statism)，相對壓縮了民主空間，因此，人民對民主的偏好又再次逐漸增加。而於2008年梅德維傑夫執政後，為了增加個人權勢空間，增加個人聲望與普金相抗衡，再加上2008年底的金融風暴襲擊全球，為了能穩固政權的正當性，對於人民、政黨和聯邦主體都稍微地放鬆國家控制，故，又增加了人民對民主的偏好。

表四 「您認為現在對俄羅斯而言，何者較為重要：秩序或民主？」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что сейчас важнее для России: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

單位：%

	秩序，即使為了維持秩序必須做出一些違反民主原則和個人自由的限制	民主，即使為了尊重民主原則，有時會給予包含破壞社會秩序及犯罪元素的自由	難以回答
1998年 2月	71	14	16
1999年 2月	77	14	8
2000年 2月	72	13	15
2000年 4月	81	9	10
2001年 6月	75	8	17
2004年 12月	75	13	11
2005年 12月	70	18	13
2006年 12月	68	11	21
2007年 7月	68	18	15
2009年 12月	59	18	22
2010年 12月	56	23	21

資料來源：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a)。

作者認為由此分析，更可探見俄羅斯的民主抉擇更操縱在普金與其統治菁英的手中，且從表四的結果顯示，超過半數的人民(56%)仍然肯定普金與其統治菁英的決策與作為，因此顯示普金與統治菁

英所建構的權力層級體系是極其穩固的，即使在梅普共治時期，普金的權力仍不受撼動，而達到穩定是普金政權的基本原則，而從上面的民調顯示，這樣的政策與作為是符合這大部分俄羅斯人民的期待。

五、結 論

2011年9月24日，俄羅斯現任總統梅德維傑夫正式推舉總理普金參選2012年的總統大選(BBC News, 2011)，普金無論是民眾支持度或是實際的政權治理操作中，都擁有相當強的統治正當性基礎，這也表明了，擅走民粹主義的普金，已讓俄羅斯民眾不僅對普金的政治價值觀充分認可，而且也認可了「主權民主」為政治理念基礎的普金主義。未來可預見，普金如於2012年再次當選總統後，普金更以控制國家原物料與經濟走向，及加強政績的效率來當作可控制變項加強其政權正當性與執政方向。

可是，令人擔憂的是，其一是普金的威權政治系統的動機是統治菁英的鞏固權力需求，而其增強的推手則是極度依賴俄羅斯因原物料價格而突然暴漲的財富，也就是原物料資源的開採與出口所帶來的資金流入，而此財富壓抑了民眾負面的聲音，並帶給普金個人正面的擁戴，但這樣的維繫力量也相對是脆弱的(Brzezinski, 2008: 105)。其二，俄羅斯的市民社會基礎薄弱，公民與國家之間一直存在緊張的局勢，這樣的情況表現出公民彷彿不是國家的一部分。史奈德(Ben Ross Schneider)甚至認為在俄羅斯，行政效率和人民利益相關的問題是不會列入考量的(Schneider, 1993: 336)。而實際上，大部份政府官員終身在國家機關服務，他們已經發展出與現實社會

需求不同的個人利益偏好，因此，對於上層的統治菁英而言，維持原來社會階層結構，減少上層統治菁英與下層的人民做垂直的流動，再加上中間階層（middle class）的知識份子邊緣化傾向，就可減少權力分享的變項，愈能鞏固自身的權力與利益。但，無論是依靠原物料的經濟成長和社會階層結構的不合理走向，皆是對俄羅斯的民主化進展相當不利。

也許只有兩個因素才能擊潰這個系統，第一個因素是俄國賴以維生的原物料價格暴跌和預算收入的減少。俄羅斯的經濟正處於一個尷尬的處境，油價的攀升讓俄羅斯的資金與相關資源再次流向石油部門，停滯了產業結構的改革，而石油部門的再度由政府所控制，又降低了營運的效率，俄羅斯「荷蘭病」的病根因這次的油價飆升，又一度深植在整個經濟體內，如同吸食毒品般欲罷不能。倘若克里姆林宮仍只是在俄羅斯長期的經濟規劃與產業結構調整上紙上談兵，其源自於原物料出口而經濟成長的表象對照工業產值的下降與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與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將會如同華麗外衣下的蛀蟲般，開始扭曲整個社會結構，貧富差距會急劇拉大，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會反噬政府的油品能源的收入，支持俄羅斯權力菁英威權政治系統的主要支柱崩潰，而牽動整體系統的革新與換血。

第二個因素是官方層級結構的全面解體，而此因素是與第一個因素息息相關。權力菁英的政權鞏固來自於秩序和穩定性的宣傳，而觀察這些秩序的來源來自安全支出上的急遽增加、民主原則的捨棄、公民自由的削減等。也許從民調顯示，俄羅斯人民可為了秩序和穩定性而置民主和自由於一旁。但，政府不斷強調穩定性，實際上並無法提供穩定性。普金和其統治菁英透過層級和控制法則的改變來確保自身的安全力量和財富，這些官僚層級更要把握對國家資

源或能源有關的「財務管理」能力，而這樣的層級維繫力量是薄弱且極其危險。原物料價格的波動，或者是「後普金」時期，都可導致官方層級結構的全面解體，而這都有待日後的觀察與研究。

參考書目

- Ahrend, Rudiger. 2006. "How to Sustain Growth in a Resource Based Economy? The Main Concep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Russian Case."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478: 1-35.
- BBC News. 2011. "Russia's Putin Set to Return as President in 2012." in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5045816>. Latest update 24 September 2011.
- Bremmer, Ian and Samuel Charap. 2006. "The Siloviki in Putin's Russia: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0, 1: 83-92.
- Brzezinski, Zbigniew. 2008. "Putin's Choi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1, 2: 95-116.
- Carothers, Thomas. 2006. "The Backlash Against Democratic Promotion." *Foreign Affairs* 85, 2: 55-68.
- Duverger, Maurice. 1980.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8, 2: 165-187.
- Elgie, Robert. 2007. "Varietie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their Impact on Nascent Democracie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3, 2: 53-71.
- Elgie, Robert and Iain McMenamin. 2008.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 3: 323-340.

- Fish, M. Steven. 2001. "Conclusion: Democracy and Russian Politics." in Zoltan Barany and Robert G. Moser. eds. *Russian Politics: Challenges of Democratization*: 215-25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sh, M. Steven. 2005.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ley, Eric et al. 1995. "Russia – Old Wine in a New Bottle? The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ussian Elites, 1983-1993." *Theory and Society* 24, 5: 639-668.
- Hanson, Philip. 2007. "The Russian Economic Puzzle: Going Forwards, Backwards or Sideways?"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5: 869-889.
- Horeth, Marcus. 2001.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White Paper on Governance: A Tool Kit for Closing the Legitimacy Gap of EU Policy Making?" *Proceeding of a Workshop on Preparing Europe's Fu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mmission's White Book on Governance*. 15 February 2001. Bonn, Germany: University of Bonn.
- Hughes, James. 1997. "Sub-national Elite and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49, 6: 1017-1036.
- Huskey, Eugene. 2009. "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Nexu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 Don K. Rowney and Eugene Huskey. eds. *Russian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Officialdom from Alexander III to Putin*: 253-272.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Huskey, Eugene. 2010. "Elite Recruitment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echno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Russian Cas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3: 363-372.

- Inozemtsev, Vladislav. 2009. "The Nature and Prospects of the Putin Regime."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50, 1: 40-60.
- Kryshtanovskaya, Olga. 1995.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Nomenklatura into a New Russian Elite." *Sociological Research* 34, 6: 6-26.
- Kryshtanovskaya, Olga and Stephen White. 1996. "From Soviet Nomenklatura to Russian Elite." *Europe-Asia Studies* 48, 5: 711-733.
- Kryshtanovskaya, Olga and Stephen White. 2003. "Putin's Militocracy." *Post-Soviet Affairs* 19, 4: 289-306.
- Kryshtanovskaya, Olga and Stephen White. 2005. "Inside the Putin Court: A Research Note." *Europe-Asia Studies* 57, 7: 1065-1075.
- Lane, David and Cameron Ross. 1995. "The Changing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Elites." in David Lane. ed. *Russia in Transition*: 52-75. London: Longman.
- Lane, David.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Elite." *Europe-Asia Studies* 48, 4: 535-549.
- Lane, David and Cameron Ross. 1998. "The Russian Political Elites, 1991-95: Recruitment and Renewal." in John Higley et al. eds. *Postcommunist Elites and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34-66.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 Lane, David and Cameron Ross. 1999.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Ruling Elites 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London: Macmillan.
- Larsson, Torbj Ecircrn. 2005. "The European System of Governance and Committees: A Legitimacy and Democratic Problem or the

- Solution?” *Proceeding of a Workshop on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Legitimacy in the EU*. 1-2 December 2005. Sweden: Uppsal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Levitsky, S. and L. Way. 2006. “Linkage and Leverage: How do International Factors Change Domestic Balances of Power?” in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199-216. Boulder: Lynn Rienner.
- Linz, J. Juan and Arturo Valenzuela. 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59.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McFaul, Michael A. 2005.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 3: 5-19.
- Ministry Poluchat Partbilyty. 2008. “Gudok 28, May 2008.” in <http://edinros.er.ru/er/prtext.shtml?42597>. Latest update 3 March 2011.
- Pakulski, Jan et al. 1996. “The Persistence of Postcommunist Élite.” *Journal of Democracy* 7, 2: 133-147.
- Potter, David et al. 1997.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The Open University.
- Rivera, Sharon Werning. 2000. “Elites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Europe-Asia Studies* 52, 3: 413-432.
- Ross, Cameron. 2005. “Federalism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under Putin.” *Demokratizatsiya* 13, 3: 347-371.

- Sakwa, Richard. 2008. "Putin's Leadership: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Europe-Asia Studies* 60, 6: 879-897.
- Schneider, Ben Ross. 1993. "The Career Connec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ureaucratic Preferences and Insul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3: 331-350.
-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öderlund, Peter J. 2005. "Electoral Success and Federal-Level Influence of Russian Regional Executives." *Europe-Asia Studies* 57, 4: 521-541.
- Troxel, Tiffany A. 2003. *Parliamentary Power in Russia, 1994-2001. President vs Parliament*. New York: Palgrave.
- White, Stephen and Olga Kryshstanovskaya. 1998. "Russia: Elit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ttei Dogan and John Higley. eds. *Elites, Crises, and the Origins of Regimes*: 125-146.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Гельман, Владимир Я. 2006.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Левиафана? Политика р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олис* 2: 90-109.
- Известия. 2006. "В среду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согласилась говорить на одном языке." *Известия* 31 August 2006, late ed.: 2.
- Коргунюк, Юрий. 2001. "Партий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in http://www.partinform.ru/articles/part_str.htm. Latest update 13 January 2011.
-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07.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 январе-феврале 2007 года: Как вы считаете, в течение следующих шести месяцев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нынешним изменится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in <http://www.levada.ru/press/2007030702.html>. Latest update 20 June 2010.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09. “Медведев, Путин,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in <http://www.levada.ru/press/2009090302.html>. Latest update 12 January 2011.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a.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 in <http://www.levada.ru/press/2011011802.html>. Latest update 20 January 2011.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b. “Ситуация в стране по оценкам россиян” in <http://www.levada.ru/press/2011011404.html>. Последнее обновление 14. Latest update 20 January 2011.

Малева, Т.М. 2008.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Proceeding of a Conference on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Проблем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та*. 24 April 2008.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РФ. 2008.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 ” in <http://www.minprom.gov.ru/dep/energy/5/14/>. Latest update 20 January 2011.

Путин, В. В. 2005.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in 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5/04/25/1223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87049.shtml. Latest update 20 January 2011.

Путин, В. В. 2007.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in 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7/04/26/1156_

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125339.shtml. Latest update 20 January 2011.

Сурков, В. Ю. 2006. “Наш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демократии называется «сувер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ей».” in <http://www.edinros.ru/news.html?id=114108>. Latest update 20 June 2010.

Тихонова, Н. Е. 2008. *Россия реформирующаяся: Ежегодник. Выпуск 7*.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

Шкаратан О.И.. 2009.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неравенство и его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吳玉山。1998。〈現代化理論 vs. 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9:443-463 (Wu, Yu-Shan. 1998.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the PRC: Modernization Paradigm Revisite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 443-463.)

吳玉山。2000。《俄羅斯轉型 1992-1999 -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Wu, Yu-Shan. 2000.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1992-1999: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Taipei: Wunan.)

吳玉山。2002。〈半總統制下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俄羅斯學報》2: 229-265。(Wu, Yu-Shan. 2002. “Cabinet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Comparing Russia, Poland and the ROC.”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 2: 229-265.)

- 吳玉山。2007。〈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臺灣民主季刊》4，2：67-112。(Wu, Yu-Shan. 2007. "The Promises and Limitations of Color Revolution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4, 2: 67-112.)
- 吳玉山。2009。〈解釋俄羅斯的民主倒退〉。《臺灣民主季刊》6，1：199-205。(Wu, Yu-Shan. 2009. "Explaining Russia's Derailed Democracy."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199-205.)
- 宋鎮照等。2009。《全球金融大海嘯下的國際政治新秩序 - 變動中的亞太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金融的發展關係》。台北：五南。(Soong, Jenn-Jaw et al. 2009. *The New Orde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the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ing State Organs, Market Economy and Global Finance*. Taipei: Wunan.)
- 邱芝、范建中。2009。〈俄羅斯威權主義的合法性分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1：7-12。(Chiu, Chi and Jian-Zhong Fan. 2009. "Analyzing the Legitimacy of Russian Authoritarianism." *Research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1: 7-12.)
- 張峻豪。2010。〈總理角色與半總統制運作 - 三角關係再釋〉。《第一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2010年6月5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Chang, Chun-hao. 2010. "Role of Prime Minister and operation of semi-presidentialism: Re-explaining the Triangularity." *Proceeding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5 June 2010.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許菁芸。2010。〈俄羅斯國會之發展剖析〉。《政治科學論叢》43：119-157。(Hsu, Jing-Yun. 2010.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Parliament.”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119-157.)

許菁芸、宋鎮照。2011。〈「分」或「合」的抉擇與邏輯 - 試析俄羅斯聯邦之聯邦制〉。《問題與研究》50, 2: 1-34。(Hsu, Jing-Yun and Jenn-Jaw Soong. 2011. “The Choice and Logic between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 An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Federalism.” *Issues and Studies* 50, 2: 1-34.)

趙竹成。2010。〈合作或競逐？ - 以俄羅斯為軸心的半總統制的檢視〉。《第一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2010年6月5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Zhao, Zhu-Cheng. 2010. “Cooperation or Competition? Survey of Russia as the Axi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Proceeding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5 June 2010.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ussia's Democratic Choice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Power Elites

Jing-Yun Hsu* Jenn-Jaw Soong**

In 2008,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eft the presidenc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which forbids more than two consecutive periods in office. He has now become prime minister, but neither the power nor the image he had seems to have gone beyond the President. While the nature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remains a question mark to Russians, the power elites and groups surrounding Puti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consolidation, since they try to ensure that their patron demonstrate a greater political profile.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uling-elite power structure and its defects, fluctu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elite structure, which thereby affects Russia'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trying to analyze the power hierarchy and its boost, resource-based economy. Finally, the authors try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Russia's democratic choice to explain the policy of recentralization, which is conducted by the ruling elites of the Putin Regime, and to analyze the variables of the model which will affect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nhua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Russia.

Key words: Russia, democracy, semi-presidentialism, elite, recentralization